

中古譯經「已」對近代「了」的影響 ——語言接觸如何牽動語法演變？

劉承慧*

近代動詞附屬標記「了」創生，是漢語史上的重大議題。近代「了」和中古譯經〔動（＋賓）＋已，下句〕的「已」關係至為密切，梅祖麟（1999）指出這個語法格式是漢語發展的自然產物，蔣紹愚（2001）認為梵語絕對分詞形態表示的體貌（aspect）意義通過「已」帶入漢語，影響到近代「了」的演變。本文比較譯經「已」與先秦漢語「既成貌」（PERFECT aspect）之間的異同，以此為析論中古「已」到近代「了」發展流變的依據。

本文目的之一在檢視中古譯經「已」帶給漢語的實質影響，目的之二在探究譯經「已」和近代「了」的關係。本文主張中古對應梵語絕對分詞形態的「已」仍在漢語固有的既成意義脈絡中，然而它與非持續動詞構成定型複合格式「動〔＋〕已」，引發附屬於動詞的「完成貌」（PERFECTIVE aspect）標記創生：唐宋時期替換「動〔＋〕已」的「動〔＋〕了」語法地位確立，「了」在定型格式中虛化，遂導致構詞的「了₁」（動後「了」）與構句的「了₂」（句末「了」）分流。梵語形態促成「了₁」前身「已」的產生，但對應梵語形態變化的「已」仍統攝於漢語系統內部規律，而「了₁」的虛化也是在系統內複合格式中進行的。

本文第二節回顧相關文獻。第三節分析《左傳》記事文本的用例，解說先秦漢語既成貌表示法及其語義功能。第四節分析《世說新語》用例，說明中古文士在新舊格式之間的取捨。第五節對照譯經的既成貌表示法。第六節討論中古譯經帶來的影響，主張定型複合「動〔＋〕已」在中古晚期已經形成，近代由「動〔＋〕了」替換。第七節梳理近代初期與譯經「已」相關的〔動（＋賓）＋了，下句〕、〔動〔＋〕了（＋賓），下句〕，假設「了₁」的生成路徑。第八節提出結論。

關鍵詞：動後「已」 動後「了」 完成貌 語言接觸 漢語歷史語法

*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一・結論

近代「了」的興起和發展是漢語語法史上最重大的議題之一，過去受到很多學者的關注。蔣紹愚 (2001) 就南北朝時期的三部文士作品《世說新語》、《齊民要術》、《洛陽伽藍記》與兩部譯經《賢愚經》、《百喻經》進行比較，指出譯經裡處於特定組合關係的「已」為古漢語所無；它對應著梵語絕對分詞形態，是翻譯外來文本而產生的語法形式。這項研究建立一個很好的個案，可供我們深入探討語言接觸 (language contact) 對語法演變的影響。

語言接觸對語法的影響可以從兩種角度觀察：一是觀察外來的語法成分如何融入漢語語法體系，二是觀察外來的形式如何影響幾種同義形式的發展。前者是著眼於單一語法形式本身的演進，後者是著眼於同一語義內容所對應的不同語法形式的消長變化。

以本文論題而言，如果要觀察外來的梵語成分如何融入近代漢語，應是比較譯經「已」和近代「了」的異同。蔣紹愚 (2001) 認為，中古譯經有部份的「已」承襲自梅祖麟 (1999) 所說秦漢語言的「已」，就稱為「已₁」；但也有些在漢語找不到源頭，稱為「已₂」。近代「了」兼有兩種「已」的語法表現，這是否意味外來的「已₂」憑藉「了」融入漢語系統呢？可不可以就此推論「了」所表示的體貌意義不全是漢語體系固有？

前一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近代初期「了」是中古「已₁」同「已₂」的綜合體，「了」泯除了它們來源上的區隔。後一個問題不容易回答，原因是過去探討漢語語法演變，很少以「概念」作為歷史重構的主軸。

例如過去論說近代「了」和中古「已」、「竟」、「訖」、「畢」的淵源，幾乎都是由形式切入。梅祖麟 (1981) 指出，中古〔動 (+ 賓) + 已 / 竟 / 訖 / 畢，下句〕是近代「了」興起和發展最具關鍵的語法形式。此後許多重要的研究都環繞著這個形式觀察演變情況。然而謂語後加「已」所表達的語義內容，先秦是由狀語「既」擔綱。¹〔動 (+ 賓) + 已，下句〕和〔既 + 動詞組，下句〕表

¹ 事實上還包括同義的狀語「已」，不過先秦主要形式為「既」。為了行文簡潔起見，先秦時期只討論狀語「既」。

面形式不相同，語義相似度卻很高：它們都容許不可持續的瞬間或狀態動詞，格式意義都是「～了以後，～」。中古時期前者成長而後者消亡，試問它們有沒有替換關係？

從形式線索來探究語法變遷，主軸很明確，但卻不是沒有侷限。〔動（＋賓）＋已，下句〕、〔動（＋賓）＋竟／訖／畢，下句〕構成方式相同，因而彼此的淵源也較易於指認。〔動（＋賓）＋已，下句〕、〔既＋動詞組，下句〕相似度不高，然而在表示體貌 (aspect) 上卻有相近的結構意義，² 如果無法證明它們彼此無關，是不是有必要說明它們如何相關？

同一語義內容由幾種不同的語法形式表達，這正是語言變遷的真實反映——語言基於特定條件而衍生出新形式，在交替的中間階段 (intermediate stage) 新舊形式並存。它們的構成方式可能很接近，也可能有差距。倘或拘泥於外形，因而忽略那些構成方式差距較大的形式，將不利於權衡外來成分的影響。從語義內容可以彌補形式研究的不足：如果能夠廣泛地觀察同一概念下各種變異形式的消長關係，要推斷外來成分的影響止於語言表層，或無形中造成底蘊內涵的變動，就有了真實的憑據。

本文通過固有與外來相關語法形式的語義分析，探討譯經「已」帶給漢語的影響，從而為現代動詞後綴「了」（以下稱為「了₁」）提出來源上的假說。

二・文獻回顧

梅祖麟 (1981, 1999) 以「完成貌」稱說「了」的功能。然而在古漢語體貌研究著作中，「完成」一詞所指有分歧，時而相當於 PERFECT aspect，時而相當於 PERFECTIVE aspect。為了區別起見，本文將以「既成貌」稱說 Comrie (1976) 定義的 PERFECT aspect。³「完成貌」則專門保留給 PERFECTIVE aspect。

王力 (1944) 認為先秦句末助詞「矣」對應現代表示語氣的句末「了」（以下稱為「了₂」），現代「了₁」是先秦漢語所無。蒲立本 (Pulleyblank 1994) 贊

² 先秦〔既＋動詞組，下句〕中「既」除了表示體貌還有其他的功能。這可能是導致「既」體貌功能式微的原因。詳見第五（一）節。

³ 「既成貌」一詞已見於劉承慧 (2007)。

同現代「了₂」對應先秦「矣」的主張，但認為「矣」不為語氣詞，而是「既成貌」標記，這項功能依然存於現代「了₂」。劉承慧 (2007) 據此闡述先秦「矣」所表示的語義內容，修正蒲立本的意見，指出「矣」兼有表示「既成」、「論斷」、「評價」功能。我們認為現代「了₂」仍兼有這三項功能。⁴

Li and Thompson (1981)、Smith (1991) 都把現代漢語「了₁」稱作「完成貌」(PERFECTIVE aspect) 標記。前者指出「了₁」表示動詞所指內容被當作「整體」(entirety) 來對待。⁵ 後者指出「終了」(termination) 和「完成」(completion) 在現代漢語是彼此獨立的概念，現代漢語不存在兼涉兩者的完成貌標記；⁶「了₁」表示終了或完成是取決於動詞——若動詞指涉不含結果，「了₁」表示終了；要是涵括結果，「了₁」註記完成。

以下文獻回顧涵括三個方面，一是〔動（＋賓）＋已，下句〕的由來以及它在中古譯經的表現，二是漢語固有的「既成」體貌意義，三是唐宋時期動後「了」和句末「了」的起源。

（一）句式由來及發展

梅祖麟 (1999) 指出〔動（＋賓）＋已，下句〕這種格式早在秦漢之交就已經出現了，如 (1) 至 (2) 所示。⁷

⁴ Li and Thompson (1981, 238-300) 以 “Currently Relevant State (CRS)” (當前相關狀態) 解說現代漢語句末「了」的功能，並舉出五種使用句末「了」的情況。我們認為這五種情況也可以從「既成」、「論斷」、「評價」得到合理的詮釋。值得注意的是，Li and Thompson 主張的五種情況之間並沒有明顯的引申關係，而根據劉承慧 (2007)，「既成」、「論斷」、「評價」三種概念之間是有隱喻聯繫的。因此後者利於從整合的角度解說句末「了」的語義特性。

⁵ 原文為 “We have said that the verbal aspect suffix *-le* expresses perfectivity, that is, it indicates that an event is being viewed in its entirety or as a whole. An event is viewed in its entirety if it is bounded temporally, spatially or conceptually.” 見於 Li and Thompson (1981, 185).

⁶ 相關原文為 “Termination and completion are independent in the language. There are no perfective morphemes, or adverbials, that express these notions together.” 見於 Smith (1991, 345).

⁷ 例 (1) 至 (2) 轉引自梅祖麟 (1999, 289)。

(1) 魏亡晉國，猶重秦也。與之攻齊，攻齊已，魏為□國，重楚為□□□
□重不在梁（梁）西矣。（《戰國縱橫家書·謂起賈章》）

(2) 卜先以造灼鑽，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
首曰正足，各三。（《史記·龜策列傳》）

蔣紹愚（2001）就秦漢文獻和中古譯經的〔動（+賓）+已，下句〕用例作了比較。他指出秦漢文獻中的用例，動詞為持續動詞，⁸「已」表示「完結」；中古譯經的用例，固然有些是持續動詞，也有些是非持續動詞，⁹「已」搭配非持續動詞的時候表示「完成」。例如「覺已」、「成已」、「死已」、「至天明已」中的「已」表示完成，蔣紹愚認為此類案例並不是漢語固有，是因為翻譯梵語「絕對分詞」（absolute, gerund）形態才被引入的。

也就是說，儘管〔動（+賓）+已，下句〕是漢語固有的形式，但是隨著中古佛經譯者由「已」去對應梵語絕對分詞形態，〔動（+賓）+已，下句〕在不覺間也感染了外來語的組合特性。

蔣紹愚（2001, 73）統計顯示《賢愚經》、《百喻經》都偏向使用〔動（+賓）+已，下句〕，《世說新語》、《齊民要術》、《洛陽伽藍記》幾乎不使用該句式。然而他們卻仍接納構造方式相同的〔動（+賓）+竟／訖／畢，下句〕。究竟兩者間有什麼差異？蔣紹愚（2001, 73-75）指出如下的區別：

- (a) 「竟」、「訖」、「畢」可前加時間副詞，「已」不行；
- (b) 「竟」、「訖」、「畢」可用於全句終了，「已」分句要求下句共現；
- (c) 「竟」、「訖」、「畢」只搭配持續動詞，「已」既搭配持續動詞，也搭配非持續動詞。

亦即「竟」、「訖」、「畢」和「已」的性質不同，前三者都是動詞，「已」是功能標記——〔動（+賓）+竟／訖／畢，下句〕、〔動（+賓）+已，下句〕之間的差異不是原先所設想的同義成分選擇問題。

⁸ 持續動詞通常指涉在時間軸上具有延續性的行為活動。

⁹ 非持續動詞指涉瞬間達成的狀態，又被稱為瞬間動詞或達成動詞。

(二) 漢語的「既成貌」意義及其表示法

蔣紹愚 (2001, 76) 指出翻譯絕對分詞形態的「已」和原有的「已」語法性質不同：原有的「已」（稱作「已₁」）只搭配持續動詞，表示「完結」，外來的「已」（稱作「已₂」）搭配非持續動詞，表示「完成」。我們要繼續探究「已₂」涉及的體貌是不是全新的概念？

蒲立本 (Pulleyblank 1994) 認為上古的狀語「既」、「已」以及句末助詞「矣」都註記體貌，它們涵攝的體貌概念相當於普通語言學所謂的「既成貌」。Comrie (1976) 指出既成貌表示某狀態和它前行事件或事況之間的關聯性，¹⁰ 通常涉及兩個時間位置，一是「前行事件或事況之後續狀態所在時間」（以下稱為「參照時間」），二是「前行事件或事況發生的時間」；¹¹ 既成貌標記注明在參照時間上存有某事件或事況的後續狀態，該事件或事況發生於先前另一個時間。如「既食」表示「食」這個事件發生在參照時間之前另一時間，參照時間上的某種狀態可以視為「食」的後續狀態。既成概念的語義基礎是在兩個時間上的參照，無論持續動詞或非持續動詞都可以跟既成標記相結合。¹²

先秦狀語「既」、「已」以及句末助詞「矣」都是既成標記。中古譯經〔動（+賓）+已，下句〕之中謂語附屬成分「已」容許搭配持續與非持續動詞，按理說也是既成標記。先秦固有既成標記跟譯經「已₂」功能上的相關程度如何，仍有待梳理。

(三) 唐宋時期的「了」

唐宋時期是「了₁」、「了₂」的起源年代。張洪年 (Cheung 1977) 認為唐代變文反映出「了₁」的早期面貌，當時的「了」及其同義成分「已」、「訖」大

¹⁰ 原文為 “The perfect is rather different from these aspects, since it tells us nothing about the situation in itself, but rather relates some state to a preceding situation.” 見於 Comrie (1976, 52).

¹¹ 原文為 “One way in which the perfect differs from the other aspects that we have examined is that it expresses a relation between two time-points, on the one hand the time of the state resulting from a prior situation, and on the other the time of that prior situation.” 見於 Comrie (1976, 52).

¹² 具體例證見於第三節。

多位在動賓詞組之後，後來通過一條新生規則移到動詞和賓語之間；此一發展可能是受到梵語動詞後綴 *-tvā* 的影響，使得表示體貌意義的「了」最終與動詞直接結合。本文肯定動詞後綴「了」創生起自梵語影響，然而不贊同簡單的模仿或類推之說，也不認為動詞後綴「了」是位移的產物。¹³

再者，張洪年 (Cheung 1977, 55) 舉例說明唐代某些「了」表示「伴隨特定動作而來的狀態」(the consequential state of an action)；梅祖麟 (1981, 65) 進一步指出，現代「了₁」就如同唐代「了」，不僅表示完成貌，也表示「某件事完成于另一件事之前」，都是出於「了」分句與下句連用。

唐宋階段不但是「了₁」創生的關鍵期，也是「了₂」成立的關鍵期，兩個位置上的「了」各自擔負著重要的功能。然而性質不同的重要語法職務為什麼竟會採用同一個詞形？梅祖麟 (1994, 73-74) 指出：

晚唐五代的早期官話 (1) 有個表示事情完成的“了”字，另有個表示新情況的出現的語助詞“也”字；(2) “V(O)了”是不自由的，後面需要加上後續分句或其他成份才能打住；(3) “V(O)了也”是自由的，本身就是獨立的句子，可以打住。現代漢語 (1') 有個完成貌詞尾“了₁”，另有個句末語助詞“了₂”；(2') “V了₁(O)”是不自由的，不能打住；(3') “V了₁O了₂”（以及“V了” < “V了₁了₂”）是自由的，可以打住。

這段話我們有贊同，也有不贊同。唐代兩個「了」並非絕對互補。¹⁴ 儘管獨用的「V(O)了」在唐代文獻確實不多見，《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敦煌變文集新書》、《祖堂集》都有用例，如 (3) 至 (7) 所示：¹⁵

(3) 大使尋以今月三日到京都了。（《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4) 晚間博士惠來，畫幀功錢同量定了：五十貫錢作五副幀。（《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¹³ 本文主張動詞後綴「了₁」源自定型複合「動〔+〕了」中的「了」虛化，以此反對位移說。詳見第七（二）節。

¹⁴ 梅祖麟 (1994, 72-73) 引用劉勛寧 (1985) 的統計數據，指出《祖堂集》唯有「V(O)了也」獨自成句，「V(O)了」不獨自成句。但《祖堂集》事實上出現過獨自成句的「V(O)了」。相關說明見下文。

¹⁵ 例 (4) 轉引自蔣紹愚 (2007, 279)。例 (7) 已見於魏培泉 (2002, 511)，同頁還有另外一例「向汝與摩道，已是平欺汝了也，向汝道，未□門以前早共汝商量了」。

(5) 似世尊怜念法界內一切衆生……一個個交出離苦源，人人盡登常樂了。（《敦煌變文集新書·父母恩重經講經文·一》）

(6) 合門眷屬並良賤，稱念磨訶般若音。一剎那間遍布了，聖力明知實甚深。（《敦煌變文集新書·降魔變文》）

(7) 師問：「適來有一个僧未得喫飯，汝供養得摩？」對曰：「供養了。」（《祖堂集》）

即便兩個「了」實際分布不是絕對互補，也不妨礙梅祖麟提出的構想，就是現代「了₁」和唐宋共同語的〔動（+賓）+了，下句〕有某種關聯性，現代「了₂」聯繫唐宋共同語的「也／了也」。如果再向前回溯，「了₂」應聯繫到中古句末「也」乃至先秦句末「矣」。

楊秀芳（1991, 237-239）轉引太田辰夫所舉的《幽明錄》中的「石賢者來也」以及《佛本行集經》中的「門已開也」，另舉出《祖堂集》中的「藥山笑曰，汝來也」，說明中古到近代都有句末「也」表示完成貌之例；敦煌變文有「小娘子如今變也」，「也」同樣註記完成貌。¹⁶

中古時期「也」還繼承了「矣」表示語氣的功能，這個功能在近代同樣轉移給句末「了」。¹⁷ 魏培泉（2002, 495）統計多部唐代禪師語錄的用例，結果顯示相當於「矣」的「也₂」大致替換了「矣」；《祖堂集》禪師對話中「『也』幾乎都是『也₂』」（2002, 496）；《祖堂集》句末「了」經常與「也」結合為「了也」，功能相當於「也₂」（2002, 510-511）。

我們根據前述研究，將先秦、中古、近代三個階段與句末「了」有關的語法格式列表如下：

¹⁶ 楊秀芳（1991）並未區別「既成」與「完成」。按照本文定義，這些都屬於「既成」之例。

¹⁷ 這裡「語氣」是籠統的說法。我們認為「語氣」是用來表達說話人的言說主觀性（subjectivity of utterance）的，不過這不是本文論述的重點，權且從略。相關主張可參閱劉承慧（2008）及 Lyons（1995）。

表一：「了₂」相關的語法格式¹⁸

時代	格式
先秦	謂 + 矣
中古	謂 + (矣 >) 也
近代	謂 + 了也 謂 + 了

本文要進一步針對〔動(+賓)+了, 下句〕中「了」和「了₁」的歷史源流關係提出商榷。〔動(+賓)+了, 下句〕對應著中古〔動(+賓)+已, 下句〕, 而其中的「了」和「已」均為謂語附屬成分。近代動詞後綴「了₁」則是從「動〔+〕了」中的「了」虛化所生。「動〔+〕了」對應中古「動〔+〕已」, 而「動〔+〕已」是從譯經「動+已, 下句」中的「動+已」定型化而來。《佛本行集經》顯示以動詞和「已」直接複合為「動〔+〕已」很可能是源自某些為了與梵語的動詞形態變化構成整齊對應而被強化使用的複合案例。唐代由「動〔+〕已」構成的新格式〔動〔+〕了(+賓), 下句〕與舊有的〔動(+賓)+了, 下句〕展開競爭, 最終替換了舊有格式。「動〔+〕了」中的定型成分「了」即是「了₁」的起源。

三·先秦「既成貌」表示法：以《左傳》記事文本為例

蒲立本 (Pulleyblank 1994) 指出, 「既成貌」在先秦主要由狀語「既」、

¹⁸ 表一涉及另一個問題, 即中古「也」如何聯繫先秦「矣」? 楊秀芳 (1991, 238) 承襲太田辰夫以「也」記音的主張, 認為「也」是文讀「矣」轉為高前元音之後用來書寫某些地區方言中元音較低的同功能成分, 亦即「也」替換「矣」是方言音變造成的。陳前瑞 (2008) 反對音變說, 他認為體貌標記「也」是從先秦句末語氣詞「也」語法化而來, 是出於功能擴展。我們對於擴展說有所保留, 理由簡述如下。中古譯經被公認存有同時期的口語特徵, 但是譯經很少用「也」表示既成; 南朝《百喻經》是一部接近口語的文獻, 完全不用「也」。其次, 近代同屬南方的《祖堂集》中「也」具備「矣」所有的功能, 果真動態「也」是從靜態「也」逐步擴展而來, 《祖堂集》就代表動態「也」語法化的完成, 然而《祖堂集》中「了」正開始替換「也」。照理說, 剛完成語法化的新起成分應有很高的語法顯著性, 「也」卻是在這時候開始被「了」替換, 顯然不符合語法演變慣例。

「已」標示，句末助詞「矣」也是既成標記。我們有條件的接受蒲立本的看法，¹⁹並將援引《左傳》記事中「既」、「矣」的用例說明中古譯經「已₂」所表示的體貌意義已存於先秦漢語。²⁰

我們以《左傳》記事文本為舉證範圍，是因為「已₂」常見於佛教故事，而佛教故事跟記事體裁很接近，因此若舉出先秦記事文本中的「既」、「矣」和中古譯經的「已₂」功能相同，足可說明「已₂」沒有引進新的功能。

（一）狀語「既」

由狀語「既」註記的連動式〔既＋動詞組，下句〕起自先秦漢語：

(8) 既克，公問其故。（《左傳·莊公十年》）

(9) 穀之役，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文公元年》）

(10) 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文公二年》）

(11) 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襄公二十四年》）

(12) 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宣公十八年》）

先秦「既＋動詞組」通常暗示還有下文，〔既＋動詞組，下句〕可說是戰國定型的語法格式。²¹例(8)至(12)都採用此種格式。例(12)「既復命」承接「復命於介」而來，複說「既復命」看起來冗贅，卻是格式限定下的自然表現。這個格式隱含著時間上的註記，受狀語「既」限定的動詞所述事件必定先於下句動詞所述事件。無論「既」搭配持續動詞或非持續動詞，格式意義是相同的。

¹⁹ 蒲立本 (Pulleyblank 1994) 為文的主要目的在論述「矣」、「也」的對立，「既」、「已」是附帶內容；他指出「矣」是既成貌標記，無疑是傳統研究的正面補充。不過先秦「矣」的功能不止於表示既成。關於「矣」的功能及其與「也」對立的基礎，請參閱劉承慧 (2007, 2008)。

²⁰ 狀語「既」、「已」性質相近，而「既」代表性較高，因此只討論「既」。先秦「既」、「已」的分析，可參閱劉承慧 (1999)。

²¹ 先秦「已＋動詞組」偶而也搭配下句，如《呂氏春秋·處方》「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但只是隨機組合的產物。先秦文獻「已＋動詞組」以不搭配下句為常。先秦狀語「既」、「已」的差別請參閱劉承慧 (1999)。

例 (8) 至 (11)「克」、「歸」、「陳」、「免」屬於非持續動詞，例 (12) 中「復命於介」的「復」是不是持續動詞，不容易斷定。另方面，搭配持續動詞之例如下所示：

(13) 既食，使坐。魏子曰……（《左傳·昭公二十八年》）

(14) 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昭公三年》）

(15) 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成公三年》）

例 (13) 至 (15)「食」、「拜」、「謀」是持續動詞，然而因為受到格式意義限定，「既食」、「既拜」、「既謀之」都聚焦在「『食』、『拜』、『謀』的發生早於後續事件」，持續動詞原本隱含的「活動過程」(process of activity) 反而是次要。

讓我們進一步針對例 (13)「既食，使坐」來設想：「食」是「使坐」的前行事件，²²「使坐」發生時「食」已經結束，「既」是活動結束的標記。「食」是否涉及起迄明確的活動過程，並非格式表述的重點。

先秦「既＋動詞組」常態性地用於〔既＋動詞組，下句〕：下句事件 B 發生在「既＋動詞組」所述事件 A 之後，在 B 的時間位置上，A 處於已實現（完結或完成）狀態。由於「既」所表示的體貌和動詞本身的特性無關，因此可以自由結合持續或非持續動詞。

（二）句末助詞「矣」

先秦「矣」的問題很複雜，不是本文所能詳細討論的，可是談到先秦既成貌卻不能迴避「矣」。蒲立本 (Pulleyblank 1994) 強調「矣」是體貌標記，並不是傳統學者所說的「語氣詞」，然而比較《左傳》的記事和對話文本，即可知「矣」其實不常用於記事文本。我們據此質疑：若「矣」並非語氣詞，為什麼大都見於對話？²³ 不過「矣」仍偶見於記事，也正如蒲立本所說的表示既成。試看：

²² 例 (13) 中與「既食」搭配的主語是承上文省略的「閻沒」、「女寬」，兩個人都臣屬於晉國執政魏獻子，與「使坐」相配的主語是「魏獻子」，即下文所稱「魏子」。

²³ 表示「既成貌」和表示「特定的語氣」同樣用「矣」，是否意味「既成貌」和「語氣」之間有某種隱喻投射關係？劉承慧 (2007) 即是為此進行闡釋。

- (16) 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左傳·宣公二年》）
- (17)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昭公元年》）
- (18) 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襄公三年》）
- (19) 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襄公二十一年》）
- (20) 嬖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襄公二十七年》）

例 (16) 以刺客鉏麇潛入趙宣子居所的時間為參照，「寢門闢矣」表明鉏麇潛入之前，宣子的室門已經開啓了，而當時他衣著整齊等待上朝。例 (17) 是以公孫黑強迫徐吾犯收下聘禮的時間為參照，「公孫楚聘之矣」表明參照時間之前公孫楚已經下聘。例 (18) 至 (20) 中「矣」註記的謂語也都表述參照時間之前已然實現的事件。

例 (17) 至 (18) 「公孫楚聘之矣」、「羊舌職死矣」可由「公孫楚既聘之」、「羊舌職既死」來替換。例 (19) 「老矣」是習慣用法，無可更動。例 (20) 「動詞組+矣」則不能由「既+動詞組」替換。

例 (20) 中「至，則無歸矣，乃縊」主語是「崔子」，崔子返抵家門為參照時間，「矣」表明在此之前崔子已無親人可依。由「矣」收束的謂語若是出現在參照謂語之前，如例 (17) 至 (19) 所示，是順向陳述；例 (20) 「無歸」是「至」的前行事況而出現在「至」之後，是逆序陳述。因為「既」註記的成分只容許順向排序，「至，則無歸矣，乃縊」不可更動為「至，則既無歸，乃縊」。

例 (16) 中「寢門闢」跟「晨往」、「盛服將朝」以時間相聯繫，「矣」表示宣子室門開啓時間早於鉏麇到達；若將「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改為「晨往，寢門既闢，盛服將朝」，則失去「寢門闢」和「往」的時間註記，也偏離了原句表達的意思。

最後，「矣」不都註記已然事件。例 (21) 中「聞之」的「之」指代「子旗登門親訪陳桓子」的事情，陳桓子聽說子旗親訪的當下，是參照時間，那時候他正打算出兵，只不過還沒有付諸行動。「出」相對於參照時間是將然事件，這個事件是參照時間之前即將發生的，因此由「矣」註記。

- (21) 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左傳·昭公八年》）

註記將然事件的實現是句末助詞「矣」的專責，也是「矣」和狀語「既」另一個重要區別所在。

（三）小結

在《左傳》記事文本，無論是狀語「既」限定的謂語，或是句末助詞「矣」註記的謂語，所指事件必定與另一謂語所指事件互有時間關係。²⁴「既」和「矣」都是如蒲立本所說的既成貌標記。

然而狀語「既」和句末助詞「矣」仍有區別。「既」所註記的事件總是依照時間先後順向排列，因而形成固定格式〔既＋動詞組，下句〕，而「矣」註記的事件在成分排序上並沒有特別限定。其次，狀語「既」僅限於註記已然事件——它註記的事件必定是先於參照時間就發生的。「矣」除了用於已然事件，還用於註記參照時間上即將發生的事件。²⁵

四．《世說新語》「既成貌」表示法

在《世說新語》（以下簡稱為《世說》）成書年代，翻譯佛經已在中土流傳有相當一段時間了。《世說》新舊兼容：〔既＋動詞組，下句〕仍不時出現，透露出與前代語言的繼承關係，而新起〔動（＋賓）＋竟／訖／畢，下句〕也達到相當的使用程度，反映語言變遷的事實。

蔣紹愚（2001）指出，包括《世說》在內的南北朝文士作品，與同時期譯經呈現分明的對照。譯經主要採用〔動（＋賓）＋已，下句〕，文士之作幾乎都用〔動（＋賓）＋竟／訖／畢，下句〕。較早的研究多認為兩種格式不過是用詞的差異，可是蔣紹愚指出，「已」格式兼容非持續和持續動詞，文士作品中的「竟／訖／畢」格式原則上只接納持續動詞。²⁶

²⁴ 更確切地說，「矣」在對話文本並非如此，然而囿於本文論旨，不及詳述，詳情可參閱劉承慧（2007）。

²⁵ 又《左傳·襄公二十六年》「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也是「矣」註記將然之事的用例。「矣」在對話裡常用於註記將然之事，記事文本這種「矣」應是對話用法的延伸。

²⁶ 嚴格遵守這種限定的是《世說新語》。《齊民要術》「訖」偶而也搭配非持續動詞，如第六（一）節例（94）至（95）所示。

要是只考慮上述兩種格式，很容易讓人以為漢語非持續動詞的體貌表示法是因譯經〔動（＋賓）＋已，下句〕而引進漢語的。但先秦〔既＋動詞組，下句〕也兼容非持續和持續動詞，它的格式意義和〔動（＋賓）＋已，下句〕很接近。若由此著眼，則非持續動詞的體貌表示法已存於先秦漢語。

南北朝「矣」轉趨沒落。²⁷ 就目前所見，它遺留下的語氣功能主要由「也」接替。²⁸「也」有時候涉及體貌，但很可能不是主要標記。中古口語裡最主要的體貌標記應該是狀語「已」和謂語後加「已」。先秦漢語的〔既＋動詞組，下句〕保留在文士作品裡。

（一）〔既＋動詞組，下句〕

中古〔既＋動詞組，下句〕主要見於傳統文士的作品。這個格式在《世說》不僅和〔動（＋賓）＋竟／訖／畢，下句〕並行，更有較大優勢，用例數量多，動詞結合面也較廣。試看：

狀態動詞之例

- (22)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既成，示庾道恩。（《世說·方正》）
- (23) 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尤悔》）
- (24) 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品藻》）
- (25) 嵇中散既被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言語》）
- (26) 和既得，唯笑而已。（《儉嗇》）
- (27) 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言語》）
- (28) 賓客既散，方歎曰……（《雅量》）
- (29) 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弦既不調，擲地云……（《傷逝》）

²⁷ 請參閱劉承慧 (2007, 761-762) 對先秦和中古「矣」用例的統計。

²⁸ 詳見楊秀芳 (1991)、魏培泉 (2002)。

感知動詞之例

- (30) 既見簡文，簡文便泣下數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尤悔〉）
(31) 郗嘉賓喪，左右白郗公「郎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傷逝〉）
(32) 既知不能踰己，稍共諸生敍其短長。（〈文學〉）

位移動詞之例

- (33) 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排調〉）
(34) 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尤悔〉）
(35) 羊既去，郭送之彌日，一舉數百里，遂以出境免官。（〈賞譽〉）
(36)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悅。（〈賢媛〉）
(37) 庾既下牀，孔慨然曰……（〈方正〉）
(38) 既前，都不問病，直云……逕便出。（〈方正〉）

行為動詞之例

- (39) 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紕漏〉）
(40) 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容止〉）
(41) 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排調〉）
(42)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傲然嘯詠。（〈言語〉）
(43) 既進膾，便去，云……（〈任誕〉）
(44) 桓玄既篡位，後御牀微陷，羣臣失色。（〈言語〉）
(45) 恢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假譎〉）

以上按照一般分類作了整理。「既」搭配狀態動詞，表示瞬間進入動詞指涉的狀態，如例 (22) 至 (29)；搭配感知動詞，表示瞬間進入動詞指涉的感知情況，如例 (30) 至 (32)。位移動詞兼具「行為」、「狀態」屬性，不過受到「既」的限定，表述重心都在新狀態的發生，如例 (33) 至 (38) 所示。

例 (39) 至 (45) 是行為動詞之例。例 (39) 至 (42)「食」、「噉」、「飲」、「坐」都屬於持續動詞，然而「既食」、「既噉」、「既飲」、「既坐」因受限於格式，活動的過程並沒有被彰顯出來，很類似第三(一)節例 (13) 至 (15)。例 (43) 至 (45)「進」、「篡」、「許」所指行為隱含某種即時性的結果，「既進膾」、「既篡位」、「既許江思玄婚」也不涉及活動過程。

(二)〔動(+賓)+竟／訖／畢，下句〕

中古〔動(+賓)+竟／訖／畢，下句〕和〔既+動詞組，下句〕結構意義相近。不過《世說》〔動(+賓)+竟／訖／畢，下句〕的上句動詞大都指涉生活行為，語義類型很少。試看：

(46)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竟，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世說·文學》)

(47) 謝公與人圍碁，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雅量》)

(48) 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畫。(《巧藝》)

(49) 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汰侈》)

(50) 林公既非所關，聽訖云：「二賢故自有才情。」(《賞譽》)

(51) 王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賞譽》)

(52) 提婆講竟，東亭問法岡道人曰……(《文學》)

(53) 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文學》)

(54) 存時為何上佐，正與謇共食，語云：「白事甚好，待我食畢作教。」食竟，取筆題白事後云……(《政事》)

(55) 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儉嗇》)

(56) 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方正》)

(57) 褚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輕詆》)

(58) 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為茶，為茗？」(《紕漏》)

(59) 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雅量》)

以上「看」、「視」、「聽」、「談」、「講」、「言」、「食」、「噉」、「飲」、「坐」、「盥洗」共十一個動詞，可歸入「視聽」、「言

語」、「飲食起居」三種概念，這種單調與舊格式中動詞的多樣性，呈現強烈的對比。此外還有「哭畢」、「哭弔嘜畢」、「弄畢」、「作數曲竟」、「交禮竟」、「交禮拜訖」等用例，²⁹ 總數不超過十個。要是把「哭弔嘜畢」、「哭畢」、「交禮竟」、「交禮拜訖」歸入儀節行為，似乎就再也沒有其他明顯的動詞類型了。³⁰

新起的〔動（＋賓）＋竟／訖／畢，下句〕只接納持續動詞，然而動詞所隱含的活動過程概念卻不特別突出。試看例 (47)「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看書」（閱讀信件）是一種可持續的行為活動，不過在「看書」和「默然無言」的延續中，「竟」註記閱讀行為的結束——儘管「看」也隱含活動的起點，在格式意義的限定下，起點並沒有被彰顯。

新起格式〔動（＋賓）＋竟／訖／畢，下句〕在《世說》中用例不多，表現卻很穩定，與舊有〔既（＋動詞組），下句〕壁壘分明。試比較例 (46) 至 (49)「看」、「視」和例 (30)「見」。《世說》裡「見」用於舊格式有五例，新格式連一例也沒有，³¹ 而「看」、「視」只用於新格式。這是出於動詞的語義屬性：「見」指涉瞬間感知活動，與新格式不相容，「看」、「視」指涉可持續自主行為，適用於新格式。

此外有一項值得察考的重點，就是上下句搭配的主語是否相同。例 (60)「賊既至，謂巨伯……」上下句主語相同，例 (61)「既至，帝覈問之」上下句搭配不同的主語，「既至」的主語是「許允」。

(60) 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
（《世說·德行》）

(61)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誠允曰……
既至，帝覈問之。（《賢媛》）

²⁹ 以下依序列出各例上下文及所屬篇章。「（子荊）哭畢，向靈牀曰……」（《傷逝》）、「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嘜畢，便去」（《任誕》）、「（桓）弄畢，便上車去」（《任誕》）、「（張季鷹）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傷逝》）、「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為憂」（《賢媛》）、「王時為徐州刺史，交禮拜訖，王將答拜，觀者咸曰……」（《尤悔》）。

³⁰ 又「弄畢」、「作數曲竟」中「弄」、「作」是指涉寬泛但動詞性極高的動詞，由於和本文論旨沒有直接關係，暫時未予歸類。

³¹ 同樣地，《世說》劉孝標注「見」用於舊格式有三例，新格式一例也沒有。

例 (22) 至 (45) 總共二十五個〔既＋動詞組，下句〕用例，³² 上下句同一主語佔十五例；進一步由動詞辨析，行為動詞有七例，六例共用主語。其他三類動詞沒有特別的傾向。先秦狀語「既」之例在上下句是否共用主語方面，也沒有特別傾向。例 (46) 至 (59) 有〔動（＋賓）＋竟／訖／畢，下句〕十五例，³³ 上下句同一主語佔十二例，而上句動詞都是行為動詞。也就是無論在舊有的或新起的格式，行為動詞都有共用主語的傾向。³⁴

（三）〔動（＋賓）＋竟／訖／畢，下句〕的由來

中古文士不用同時期譯經流行的〔動（＋賓）＋已，下句〕，而是採取〔動（＋賓）＋竟／訖／畢，下句〕。然而無論是譯經形式或是文士採取的形式，跟前代語言都有同樣深切的淵源。試看：

(62) 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左傳·桓公二年》）

(63) 初，陳豹欲為子我臣，使公孫言已，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哀公十四年》）

(64) 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文公十六年》）

(65)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子產曰……既，晉之邊吏讓鄭曰……（《昭公十八年》）

例 (62) 至 (63) 中的「已」都是獨立謂語，主要功能在表明它前後事件的時間關係。例 (64) 至 (65) 中的「既」也是表明前後事件時間關係的獨立謂語。³⁵ 獨立謂語「既」不見於戰國晚期的文獻，但是「已」仍保有這種獨立表述的功能，如例 (66) 至 (68) 所示：³⁶

³² 例 (36) 中有「既往王氏」、「既還謝家」兩例。

³³ 例 (54) 中有「食畢」、「食竟」兩例。

³⁴ 這其中可能涉及譯經語言的影響，詳見第六（一）節討論。

³⁵ 同時期還有功能相當但性質有別的「已而」、「既而」。不過《左傳》只用「既而」，並且「既而」用例遠多於「既」。「既而」複合化並取得優勢，很可能是戰國晚期文獻不再以單音詞「既」表示前後事件關聯性的主因。

³⁶ 例 (68) 轉引自梅祖麟 (1999, 291)。

(66) 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戰國策·燕三》）

(67) 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而造大國之城下。（《戰國策·宋衛》）

(68) ……飲熱酒，已，即入湯中……（《五十二病方》）

梅祖麟 (1999) 指出，獨立謂語「已」約從西漢開始併入前行分句，文中列舉多個西漢用例，其中之一見於第二（一）節例 (2)。爲便於討論，再次轉引如下：

(2) 卜先以造灼鑽，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各三。（《史記·龜策列傳》）

依照戰國時期的慣例，「鑽中已，又灼龜首」可分讀如「鑽中，已，又灼龜首」。梅祖麟指出，例 (68)「飲熱酒，已，即入湯中」可合讀作「飲熱酒已，即入湯中」。這種分合兩可的情況是演變過渡時期的現象。

值得注意的是，楊秀芳 (1991, 228-229) 指出，西漢《史記》已出現下列的用例：³⁷

(69) 淳于髡說畢，趨出。（《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70) 丞相奏事畢，因言曰……（《張丞相列傳》）

(71) 乃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吳王濞列傳》）

例 (69) 至 (71) 顯示〔動（+賓）+畢／訖，下句〕和〔動（+賓）+已，下句〕的生成年代相當接近。例 (71)「讀之訖」緊連上文「讀之」，行文中再次重複，是值得注意的。³⁸

又《世說》劉孝標注也出現以下用例，³⁹ 其中「畢」、「訖」也是表明前後分句時間關係的獨立謂語：

(72) 徐徐乃著岑牟，次著單絞，後乃著禪。畢，復擊鼓摻槌而去，顏色無忤。（《世說》劉孝標注引《文士傳》）

(73) 又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為設精饌，訖，問：「關中之食，孰若於此？」（《世說》劉孝標注引裴景仁《秦書》）

³⁷ 例 (69) 至 (71) 轉引自楊文，惟因應本文論述需要，增補了前後文句。

³⁸ 這或許意味著終了義獨用謂語併入前行分句的趨勢在西漢已經形成，故而行文間遇到不容許直接併入的情況，即重複前行成分。這可以跟第三（一）節例 (12) 複說「既復命」相對照。

³⁹ 劉孝標注編成年代略晚於《世說》，但徵引的文獻有許多是早於《世說》的。可以說劉孝標注是反映《世說》同時期及其前一階段的文士語言面貌。

例 (72)「畢」只能分讀，例 (73)「訖」可與前行分句合讀為「會稽王道子為設精饌訖」。若按照「表明時間關係的獨立謂語『已』併入前行分句」同樣的道理設想，「畢」應有併入的用例，而事實也是如此：

(74) 酹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世說》劉孝標注引謝承《後漢書》）

例 (74)「酹酒畢，留謁即去」若分讀為「酹酒，畢，留謁即去」，即為早期形式。分讀與合讀兩可的用例有三項特徵，一是獨立謂語前後分句共用主語，二是前分句動詞指涉可持續的行為活動，三是前分句不含包孕成分，也沒有狀語或其他關聯詞共現。

（四）小結

總之，《世說》沿用先秦〔既＋動詞組，下句〕作為表示「既成貌」的主要形式，又兼用漢代新起〔動（＋賓）＋竟／訖／畢，下句〕。後者可能來源於表述前後事件時間關聯性的獨立謂語「畢」、「訖」之類併入前行謂語。

秦漢之交〔動（＋賓）＋已，下句〕也是基於相同的併入路徑而興起。⁴⁰ 不過由於〔動（＋賓）＋已，下句〕被用來翻譯梵語帶有絕對分詞形式的句子，導致「已」發生性質變化，因而和「竟／訖／畢」有了區別。至於中古譯經並未採用功能意義相同的〔既＋動詞組，下句〕，很可能是因為「既」表示既成的功能在東漢口語已經式微了。第五節將從幾部具有代表性的中古譯經舉證支持這個設想。

五・中古譯經「既成貌」表示法

中古譯經仍沿用狀語「既」、「已」，然而「既」不再是表示既成概念的主要形式，「已」相對變得發達。其次，〔動（＋賓）＋已，下句〕常用於翻譯帶有絕對分詞形式的梵語句子，其中的「已」仍可理解為既成標記。

⁴⁰ 同義或同功能成分依循相同的路徑演變，這有許嘉璐 (1987) 所謂的「同步引申」以及梅祖麟 (1997) 所說的「反覆出現的演變方式」作為支持。

(一) 狀語「既」

中古譯經幾乎不單用狀語「既」表示既成貌，「既」傾向與另一個成分共同搭配表示既成，如例 (75)「既悔過畢」是「既」搭配「畢」。這種變化很可能是爲了區別「既」的幾種功能。

(75) 既悔過畢，稽首而退。(《六度集經》)

早在先秦「既」就用於註記並列和推斷關係。⁴¹ 例 (76)「既來之，則安之」是推斷，例 (77)「既庶矣，又何加焉」、「既富矣，又何加焉」是並列。其中「既」限定的動詞組所述內容都被設想爲真實，應與「既」最初表示既成有關。

(76)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論語·季氏》)

(77)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論語·子路》)

狀語「既」在東漢《中本起經》共有三例，如例 (78) 至 (80) 所示。例 (78) 由推斷關係聯繫兩個分句，「既」是推斷關係之條件標記。例 (79) 的兩個分句由並列關係相聯繫，「既～又～」是並列標記。例 (80)「此郡既飢，人不好道」中兩個分句關係曖昧，可能是推斷，也可能是並列。

(78) 既利以平均，如是衆附親。(《中本起經》)

(79) 我年既幼稚，學日又初淺。(《中本起經》)

(80) 佛告比丘僧，此郡既飢，人不好道，各各自便，隨利分衛。(《中本起經》)

三國吳地所譯《六度集經》，狀語「既」有八例，其中五例用於並列關係。⁴² 又有「女既賢明，深知吉凶天文占候」一句，分句聯繫方式有模糊，不過並列的可能性較高。八例之中，只有「既生之後，諸病並進」以及「既悔過畢，稽首而退」(已見於例〔75〕)是既成之例，前者由「既～之後」，後者由「既～畢」聯合註記既成。

⁴¹ 這裡「並列」是一種寬鬆的說法，包含「平舉」及「層遞」之例。

⁴² 這五例是「既聖且仁」兩例，還有「既賢且明」、「既有智慧，而復一心即近度世」、「亡女既歸，又致聖婿」各一例。

中古譯經語言要比同時期文士作品更貼近口語面貌，東漢譯經又比吳地譯經更能反映中古早期口語實況。狀語「既」在《中本起經》和《六度集經》的表現是觀察演變的重要線索：《六度集經》不單用「既」表示既成，《中本起經》完全不用「既」表示既成。可見〔既＋動詞組，下句〕原本隱含的時間參照意義正從東漢口語消失。我們還可以從中古晚期譯經得到佐證：

(81) 長者欣悅，即設供具，共相娛樂，終竟一日，賓客既罷。是時長者召諸兒婦而告之曰……（《賢愚經》）

(82) 爾時帝釋忉利天王，既知世尊心意所念。知己，即於彼之處所，以手掘地，造作一池，其水清淨。（《佛本行集經》）

例 (81)「賓客既罷」後續另由設定時間背景的「是時」起頭，因此「賓客既罷」和「長者召諸兒婦」雖為前後事件，形式上卻是由句界相隔的。如果按照先秦語言習慣，「賓客既罷」應作「賓客已罷」。⁴³ 例 (82)「既知世尊心意所念」跟後續分句同樣是由時間相連貫，但「知己，即於彼之處所……」顯然套用〔動（＋賓）＋已，下句〕。可見狀語「既」構成的謂語是獨立表述單位，已不再強制搭配下句。

例 (82) 這種用例，很有可能是從例 (83)「既知世尊聖教法已」之類的用例變化出來的：

(83) 既知世尊聖教法已，從坐而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佛本行集經》）

簡言之，「既」搭配另一個表示終了的成分，共同表示既成，約在東漢以後逐漸形成慣例，〔既～已，下句〕也在譯經流行一時。「既知世尊心意所念」和「知己」應是進一步由「既知世尊心意所念已」拆解而成。如此拆解或許是為配合經書韻律，然而假使同時期口語仍舊像先秦漢語一樣嚴格要求狀語「既」限定的謂語和下句共現，就必須另謀其他的對等形式；之所以能夠直接拆解，很可能是因為〔既＋動詞組，下句〕已經失去表示既成的功能，這時候狀語「既」就變得像狀語「已」一樣不受下句共現的約束。

⁴³ 根據劉承慧 (1999, 578-579)，先秦「既」與下句連用是常態，如果沒有下句，慣例是用「已」不用「既」。

(二)〔動(+賓)+已，下句〕及狀語「已」

中古譯經狀語「已」和謂語後加「已」並行。它們的區別可以從以下的對照得知：

(84) 處於山樹間，何物洗身垢，道藏為浴池，正水滿其淵，浴已三毒盡，三達快無雙。(《中本起經》)

(85) 王到已，太子五體投地，稽首如禮。(《六度集經》)

(86) 佛告迦葉，三界欲火吾已滅之，龍不害我也。(《中本起經》)

(87) 吾所當為諸比丘說者，皆已說之。吾志所求，皆已成也。(《六度集經》)

例(84)中「三毒盡」是「洗浴」終了狀態。例(85)中「王到已」、「太子五體投地」是連續事件，前者完成正接續著後者起始。例(84)至(85)可說是謂語後加「已」的兩種典型案例。⁴⁴ 例(86)中「三界欲火吾已滅之」和「龍不害我也」兼具時間和因果關係，後分句既非前分句的終結狀態，也非接續事件，因此用狀語「已」。⁴⁵ 例(87)「皆已說之」、「皆已成也」都不搭配下句，也都是採用狀語「已」。

據此而言，〔動(+賓)+已，下句〕須有以下兩者之一的關聯性：(一)下句表示上句事件的終結狀態，(二)上下句表述緊密相連的事件。若非如此，就用狀語「已」。

讓我們再作進一步的比較。例(88)至(90)都是狀語「已」之例：

(88) 阿難已得其麥，以鉢受之，心用悲疾曰……(《中本起經》)

(89) 辱心已生，火即還滅。(《賢愚經》)

(90) 時婆羅門作呪自護，七日已滿，便來辭王。(《賢愚經》)

例(88a)至(90a)是我們把狀語「已」改為謂語後加「已」所作的對照組：

(88a) 阿難得其麥已，以鉢受之，心用悲疾曰……

(89a) 辱心生已，火即還滅。

⁴⁴ 例(84)至(85)或許就代表梵語絕對分詞形態的兩種典型。例(85)中「已」註記先於「太子五體投地」的事況，即「王到」；例(84)中「已」註記伴隨「三毒盡」的事況，即「浴」，而「浴」同時也是導向「三毒盡」的途徑或手段。兩種用例正好符合陳淑芬(Chen 2006)引述的梵語絕對分詞的語法作用。請參見第六(一)節及註46。

⁴⁵ 例(86)至(87)句末助詞「也」均相當於先秦「矣」。

(90a) 時婆羅門作呪自護，滿七日已，便來辭王。

例 (88a)「阿難得其麥已，以鉢受之」表述連續事件，「已」表明「得其麥」在「受之」的當下處於實現狀態。例 (88)「阿難已得其麥，以鉢受之」的「已」涵蓋「得麥」、「受之」，它表明兩者皆為實然事件，「心用悲疾」是後續結果。再把「心用悲疾」納入分析。例 (88a) 的內部成分受到〔動（+賓）+已，下句〕的制約，以時間聯繫為主，「心用悲疾」順勢承接，以時間為線索，「用」相當於「於是」。例 (88)「得其麥」、「以鉢受之」兩個成分並列，「用」相當於「因此」。

例 (89a)「辱心生已，火即還滅」中「已」意謂「火滅」是「辱心生」瞬間造成的延伸狀態，這種語義聯繫正與例 (84)「浴已三毒盡」一致。雖然兩例中謂語動詞性質有別，「浴」是持續動詞，「生」是瞬間動詞，但是「已」的功能並沒有重大差異。例 (89)「辱心已生」是實然事況，「火即還滅」是結果；這兩種事況依照發生先後排序，而同一序列也容許因果解釋。例 (90a) 中「滿七日已」和「辭王」之間隱含「一到～，就～」的連續（不間斷）關係。例 (90)「七日已滿，便來辭王」則存有較明顯的因果意味。

謂語後加「已」和狀語「已」還有一個重要區別，就是後者只用於已發生的事件或已實現的事況，前者可用於表示將然或假設事況：

(91) 燒香誓願，願我所有功德，迴向佛道，我成佛已，自調其心，亦當調伏一切衆生，若以一衆生故，在於阿鼻地獄，住經一劫，有所益者，當入是獄，終不捨於菩提之心。作是誓已……（《賢愚經》）

例 (91)「我成佛已……終不捨於菩提之心」是誓願之辭，所述內容為將然事況，下文「作是誓已」則為已然事況。表示將然事況的謂語後加「已」不可能由狀語「已」替換。

（三）小結

中古初期狀語「既」功能正式分化，先秦文獻最常見的既成格式〔既+動詞組，下句〕很可能已經從東漢口語中消失。狀語「已」取得相對優勢。狀語「已」和謂語後加「已」在中古並行，謂語後加「已」註記時間順序的功能比狀語「已」要明確，狀語「已」註記的分句往往與後續分句隱含因果聯繫。兩種「已」功能有重疊卻不完全重合，這是狀語「已」立於不墜的主要原因。

六・中古譯經帶來的影響

根據第三至五節的舉證，先秦到中古「既成貌」表示法發生了下面的變化：

（一）秦漢以後〔既＋動詞組，下句〕因為功能分化導致形式改變，中古口語表示既成貌的「既」開始與其他成分共同搭配，構成「既～之後」、「既～畢」、「既～已」等組合式標記。

（二）在中古傳統文士的書面作品裡〔動（＋賓）＋竟／訖／畢，下句〕局部替換了〔既＋動詞組，下句〕，持續動詞偏向採用新格式。非持續動詞仍沿用舊格式。

（三）這種局部替換現象主要是受限於獨立謂語「竟／訖／畢」只有在前行分句動詞指涉可持續活動的條件下，才容許併入，組成〔動（＋賓）＋竟／訖／畢，下句〕。

（四）東漢到南北朝一段期間「動＋已」被約定用於翻譯梵語的絕對分詞形式，導致〔動（＋賓）＋已，下句〕中「已」的性質改變，遂不再限定搭配持續動詞。

（五）在動詞不帶賓語的情況下，「已」處於緊鄰動詞的位置，此時翻譯形式與固有形式一致。若動詞帶賓語，「已」順應漢語語法，只能放在動賓詞組之後，構成〔動＋賓＋已，下句〕，然而其中的「已」兼容持續與非持續動詞。

儘管中古文士書面語保留了先秦既成格式〔既＋動詞組，下句〕，中古譯經卻顯示這個格式表示既成的功能在口語中轉趨式微，因此需要新的替換形式，而此時〔動（＋賓）＋已，下句〕、〔動（＋賓）＋竟／訖／畢，下句〕都是選項。〔既＋動詞組，下句〕兼容持續與非持續動詞，替換形式須有同等的包容性，因此受譯經影響的〔動（＋賓）＋已，下句〕出線機會高於〔動（＋賓）＋竟／訖／畢，下句〕。

（一）譯經對漢語相關語法形式的影響

中古譯經表示既成貌的主要形式為〔動（＋賓）＋已，下句〕。同時期並行的語法格式有沒有受到感染呢？

陳淑芬 (Chen 2006, 298) 引述 Whitney (1993) 指出，梵語絕對分詞是動詞轉化的附屬於分句之邏輯主語的動名詞 (verbal noun)，表示伴隨或（更常見的

是)先於該分句主要動詞所指行為的另一個行為。⁴⁶ 中古譯經〔動(+賓)+已,下句〕用例中兩個分句經常共用主語,反映出梵語的絕對分詞的構句實況。⁴⁷ 第四(二)節提到《世說》由行為動詞構成的〔既+動詞組,下句〕用例有上下句共用主語的傾向,而先秦〔既+動詞組,下句〕用例無此傾向,或許受到譯經感染。⁴⁸

另一個影響來自於不帶賓語的「動+已」。譯經不帶賓語的「動+已,下句」很常見,《世說》不帶賓語的「動+竟/訖/畢,下句」用例遠多於帶賓語的「動+賓+竟/訖/畢,下句」,或許與此有關。

此外,譯經格式的特徵偶而會出現在文士書面語。試看:

(92) 易怪之,乃為探出之,有三子。生畢,牝虎負易還,再三送野肉於門內。(《搜神記》)

(93) 猛乃以手中白羽扇畫江水,橫流,遂成路陸,徐行而過,過訖,水復。(《搜神記》)

例(92)「生畢,牝虎負易還」屬於〔動(+賓)+畢,下句〕,「生」是非持續動詞。例(93)「過訖,水復」屬於〔動(+賓)+訖,下句〕,「過」上承「徐行而過」,指涉非持續的結果狀態。這兩個用例反映出譯經格式的特徵偶而也影響到書面語的表現。

又《齊民要術》也有「訖」搭配非持續動詞的用例,如例(94)至(95)「曝乾訖」、「取訖」所示:

⁴⁶ 相關引文轉錄如下:“The so-called gerund is a stereotyped case (doubtless instrumental) of a verbal noun, used generally as adjunct to the logical subject of a clause, denoting an accompanying or (more often) a preceding action to that signified by the verb of the clause. It has thus the virtual value of an indeclinable participle, present or past, qualifying the actor whose action it describes.” (Whitney 1993, §989)

⁴⁷ 譯經絕大多數的〔動(+賓)+已,下句〕都是上下句共用同一個行為者主語,但也有很少數的用例是不共用主語的。囿於我們對梵語的認識不足,對中古譯經的版本所知有限,無法直接探討這個問題。不過,以下要引用陳淑芬(Chen 2006)來作印證。該文(2006, 298-299)比對了《金剛經》梵文原本和達摩笈多的譯本,指出「已」不僅翻譯 -tvā 或 -ya 形態的絕對分詞,還用來翻譯 -ta 形態的「過去被動分詞」(past passive participle)。「過去被動分詞」的性質和「絕對分詞」不同,翻譯過去被動分詞的「動+已」或「動+賓+已」沒有共用主語的約束。

⁴⁸ 事實上〔動(+賓)+竟/訖/畢,下句〕也有共用主語的傾向。不過這種傾向似乎在《史記》即已如此,未必是譯經的影響。

(94) 九月熟，曝乾訖，剝殼取食之，味似栗，出交趾。（《齊民要術·五穀、果蓏、菜茹非中國物產者》）

(95) 鋤時別作小刀鋤，勿使細土覆心。今秋取訖，至來年更不須種，自旅生也。（《伐木》）

然而上述兩項畢竟都不涉及語法架構的變動。真正對語法架構造成衝擊的是動詞和「已」直接複合，形成定型複合格式。簡言之，動詞帶賓語的時候，爲了順應漢語固有形式，翻譯絕對分詞形態的「已」只能放在賓語後面，例如「既知世尊心意所念已」、「既知世尊聖教法已」都是如此。「動+賓+已」跟梵語形態變化不構成整齊的對應，可說是爲了牽就漢語而生出的妥協形式。然而貫串整個中古的妥協精神到了晚期發生鬆動。第五（一）節例（82）前後相續的「既知世尊心意所念」、「知已」很可能是從「既知世尊心意所念已」拆解而成，這種拆解形式在《佛本行集經》很常見。《佛本行集經》大量使用冗贅複合形式「動+已」正反映出梵語動詞形態變化在中古漢語發生了某種影響。

（二）中古早期和晚期譯經語言的比較

中古早期和晚期譯經，語言面貌存有相當顯著的差異。早期譯經較貼近先秦文獻語言，晚期譯經無論在故事情節敘述方式上或在句子成分安排上，都跟原典語言的關係較爲密切。試比較：

(96) 佛言，便去，今隨後到。迦葉適還，佛如人屈伸臂頃，東適于逮數千億里，取樹果名閻逼，滿鉢而還。迦葉未到，已坐其床。（《中本起經》）

(97) 爾時世尊，既發遣彼優婁頻螺迦葉去已，即乘神通，向須彌山。是時彼山，有閻浮樹，以彼閻浮樹因緣故，所以得此閻浮提名。於彼樹上，取得菓已，於先來至優婁頻螺迦葉居處火神堂中，端然而坐。（《佛本行集經》）

例（96）至（97）分別引自東漢《中本起經》和隋代《佛本行集經》，記述迦葉皈依佛法的同一片段經過。因爲兩部譯經的原典版本資料不明，我們不可能進行深入的比對，但可得知《中本起經》的譯文牽就漢語特點，並沒有採取〔動（+賓）+已，下句〕翻譯梵語的動詞形態變化，同時又使用「迦葉未到，已坐

其床」這種帶有戰國語言風格的句式。⁴⁹《佛本行集經》的譯文採用了中古新起〔既～已，下句〕和〔動（＋賓）＋已，下句〕；最末一句「於彼樹上，取得菓已，於先來至優婁頻螺迦葉居處火神堂中，端然而坐」，似乎是直譯。

(98) 見諸梵志衣被什物及事火具，隨流漂下。二弟驚愕，恐兄及諸弟子為人所害。（《中本起經》）

(99) 見於彼等鹿皮之衣及祭火神器皿調度，隨水沿流。見已慄然，心生恐怖而發此言，咄咄異事，我兄或能為賊所破，不者居處被他殺也。（《佛本行集經》）

再比較記述同一事件片段的例 (98) 至 (99)。例 (98) 敘事方式很接近傳統文士作品。例 (99)「見已慄然」的「見已」值得注意。《佛本行集經》經常採用這種重複前行動詞的方式來敘事：

(100) 時太子見彼鴈帶箭被傷墮地，見已，兩手安徐捧取，取已，加趺，安鴈膝上。（《佛本行集經》）

(101) 爾時世尊復如是念，我洗衣已，復於何上曝曬此衣？爾時帝釋知佛心念，知已，即從鐵圍山間，將一最大寬廣之石，安置佛前。既安置已，即白佛言，唯願世尊，於是石上，以用曬衣。（《佛本行集經》）

例 (100) 要改為「時太子見彼鴈帶箭被傷墮地，兩手安徐捧取，加趺，安鴈膝上」，才符合漢語慣例——「見」、「取」都是非持續動詞，「見彼鴈帶箭被傷墮地」、「兩手安徐捧取」隱含即時性的結果意味，無需用「已」。「見已」、「取已」重複前分句內容，似乎只是為了和梵語動詞變化形成整齊的對應。例 (101)「知已」、「既安置已」應是出於同樣的理由而複說。

就表現形式而言，漢語原先並不發達的構造方式有可能因為語言接觸之故而被激發。例如「見已」、「取已」中的「已」把「見」、「取」固有的瞬間達成意涵彰顯出來了，這在前代語言來說只是冗贅，然而一旦如此彰顯又持續擴散，將會改變動詞構造方式。「已」在《佛本行集經》和光桿動詞經常性的結合，意味著梵語動詞形態變化在長時期語言接觸之下對漢語造成了衝擊。

⁴⁹ 更接近戰國記事語言的措辭方式應該是「迦葉未到，坐其床矣」。不過從戰國到東漢這段期間語言面貌已經有很大的改變，「矣」趨於式微。「已坐其床」或許是在這種情況下替換戰國「坐其床矣」的書面語形式。

以光桿動詞和「已」合為「動+已」，充當〔動（+賓）+已，下句〕的上句成分，是《佛本行集經》很常見的現象。試看表二的統計：

表二：《佛本行集經》經常與「已」複合的動詞

入	出	生	成	至	作	坐	見
7	13	11	6	7	5	8	98
到	取	受	知	食	得	散	聞
86	5	8	9	6	9	11	30

表二中列入計算的是「見已，兩手安徐捧取」的「見已」之類；要是句中有主語共現，如「彼人至已，各昇高座」，就不列入計算。《佛本行集經》少說也有十種高度固化的「動+已」。「已」在這些固化形式不斷重現，很容易轉作定型成分，構成定型複合格式「動〔+〕已」。⁵⁰ 中古晚期譯經「動〔+〕已」是近代定型複合「動〔+〕了」的源頭。

（三）中古譯經「動〔+〕已」到近代「動〔+〕了」

中古譯經翻譯梵語動詞形態變化的「已」最初因應漢語語法原則，是附屬於謂語的標記，近代替換「已」的「了」演變為附屬於動詞的標記，關鍵在「動〔+〕已」。《賢愚經》、《佛本行集經》都顯現出「已」與光桿動詞複合的傾向。從兩部譯經裡「動+已」用例的增長，乃至《佛本行集經》拆解「既～已」詞組並抽取其中的動詞與「已」複合為「動+已」，都導向一個合理的假設，就是定型複合格式「動〔+〕已」確立了它的地位。

李訥、石毓智 (1997, 90) 指出，唐五代時期「動+了」中插狀語有限制，正反映出這種組合形式「……在唐五代時期已經具有很強的凝結成一個語法單位的傾向」。吳福祥 (1998, 454) 肯定上述意見，主張「這個現象說明『了』在『動+賓+了』和『動+了』兩式裡性質並不相同，前者是作為句子的謂語動詞，後者是用作謂語動詞的結果補語」。試看吳福祥 (1998, 454) 的舉例：「即付了」、「纔見了」中的狀語都出現在動詞前面，表示「了」和動詞結合緊密。

⁵⁰ 劉承慧 (2003, 2002) 指出「定型複合」是戰國以後漢語最主要的造詞手段。定型複合機制的產物有別於隨機結合的自由詞組，因此本文中採用不同的符號：自由詞組的兩個成分之間以「+」表示連結關係，定型複合成分之間以「〔+〕」表示連結關係。

(102) 法即付了，汝不須問。（《六祖壇經》）

(103) 聖君纔見了，⁵¹ 流淚兩三行。（《敦煌變文集·歡喜國王緣》）

補語「了」的形成是在「動〔+〕已」>「動〔+〕了」格式中發生的。「動〔+〕已」是翻譯而產生的新形式，然而只要進入漢語並為使用者所接納，遲早都會內化到漢語系統。中古最可能收納「見已」、「取已」的結構是並列複合。⁵² 如果「動〔+〕已」中的動詞是非持續動詞，「已」就是表述內容與動詞重疊的冗贅成分，這種冗贅成分終將失去來源動詞的表述性，成為語法功能標記。由於譯經的流布範圍很廣，中古語言長期存有非持續動詞組成的「動〔+〕已」用例，是「已」及其後繼者「了」性質蛻變的有利條件。

在唐代口語文獻中，動詞和「了」直接組合充當上句的比例很高，⁵³ 內部結合緊密度也很高。附屬於動詞的「完成貌」標記很可能是從定型複合「動〔+〕了」中「了」虛化演變而來。簡言之，唐代「動〔+〕了」作為「動〔+〕已」的替換形式，仍有大量非持續動詞的用例。亦即從中古定型複合第二成分「已」延續到唐代「了」，一直都處於有利蛻變的環境。因此唐代「動〔+〕了」很可能已經轉為動補複合，「了」是補語。⁵⁴

補語「了」和一般由動詞逐步虛化產生的結果補語不同。由動詞虛化的結果補語往往帶有結果意涵，例如「推倒」的「倒」在非隱喻的用法裡實指某種結果狀態，「見了」的「了」不然，它註記的結果狀態取決於「見」的指涉。如果是與持續動詞「哭」組合，「了」註記活動終了。Smith (1991) 所說現代漢語「了」表示終了或完成係取決於動詞，可以回溯到唐五代「動〔+〕了」中的「了」乃至中古譯經「動〔+〕已」中的「已」。

七·近代與譯經「已」相關的「了」字結構

⁵¹ 原引文作「聖王纔見了」，這裡依照《敦煌變文集》、《敦煌變文集新書》改為「聖君」。

⁵² 並列式在中古很流行。《世說》裡有大量品評人物的術語，就是通過並列複合衍生的，具體的例證見於劉承慧 (2003, 131)。

⁵³ 具體例證請參閱趙金銘 (1979)。

⁵⁴ 本文仍沿用「補語」一詞稱說「動〔+〕了」中的「了」，是考慮到它在唐代可能還沒有完全蛻變為動詞後綴。

唐五代時期至少有三種「了」字結構，其一是〔動（＋賓）＋了，下句〕，其二是〔動（＋賓）＋了〕，其三是定型複合「動〔＋〕了」。

關於近代「了」的由來說法不一，有「虛化說」，有「替換說」。兩者適用於不同結構中的「了」。近代〔動（＋賓）＋了，下句〕替換中古〔動（＋賓）＋已，下句〕，一旦替換發生，「了」就取代「已」成為格式標記。又近代〔動（＋賓）＋了〕替換中古〔動（＋賓）＋也〕，「了」替換「也」之後也成了語法標記，在此之前是表述終了義的獨立謂語。⁵⁵「動〔＋〕了」替換「動〔＋〕已」，中古「動〔＋〕已」應該是並列複合，但是隨著「了」虛化，唐五代「動〔＋〕了」已是動補複合。

句末「了」和先秦「矣」淵源很深，與譯經「已」沒有直接關係，囿於本文主旨，暫予擱置。⁵⁶ 以下討論近代兩種與譯經「已」相關的「了」字結構。

（一）〔動（＋賓）＋了，下句〕

近代〔動（＋賓）＋了，下句〕和中古〔動（＋賓）＋已，下句〕可以說是同一格式在不同歷史階段的表現。「了」即如「已」兼容持續與非持續動詞，如例（104）至（105）所示：

（104）國主乍聞心痛切，朝臣知了淚摧摧。（《敦煌變文集新書·歡喜國王緣》）

（105）軍官食了，便即渡江。（《敦煌變文集新書·伍子胥變文》）

例（104）下句表示上句事件的終結狀態，例（105）上下句表述緊密相連的事件，可以例（84）至（85）相互對照。在「了」替代「已」的過渡階段曾經出現過並列複合標記「已了」，如例（106）至（108）所示：

（106）盧綰報哀已了，却共王陵到於漢界。門家奏言：「王陵救母却迴。」遂乃詔至殿前，拜舞已訖，漢王曰……（《敦煌變文集新書·漢將王陵變》）

（107）葬父已了，欲向主人家去。（《敦煌變文集新書·搜神記》）

⁵⁵ 當「了」還是句末獨立謂語時，不可能替換句末「也」，它得先發生虛化，然後才開始替換的過程，這其中仍涉及虛化問題。關於近代句末「了」的起源，請參閱劉承慧（2010, 400-404）。

⁵⁶ 同前註。

(108) 授八戒已了，歸家日滿，便乃身亡，生在天中，受諸快樂。（《敦煌變文集新書·歡喜國王緣》）

例 (106)「已了」、「已訖」用於同一上下文，「已訖」來自中古譯經，功能即如「已」。⁵⁷ 例 (107)「葬父已了」的「葬」所指行為即隱含某種結果，⁵⁸「已了」如同表示完成的「已」。例 (108) 至 (109) 位在同一上下文，「受戒了」的「了」與「授八戒已了」的「已了」功能相同。

(109) 有於（相）夫人於石室比丘尼所，受戒了，歸來七日滿，身終也。（《敦煌變文集新書·歡喜國王緣》）

除了「已了」之外，敦煌變文還有複合的「既了」。例 (110)「歎之」也是非持續動詞，「既了」相當於譯經的「已」，而非《世說》「竟／訖／畢」。

(110) 須達歎之既了，如來天耳遙聞，他心即知，萬里殊無障隔。（《敦煌變文集新書·降魔變文》）

然而例 (110)「既了」卻透露出更多的訊息。中古文士書面語不像譯經那樣大量使用並列複合標記，但偶有狀中複合式「既竟」、「既訖」、「既畢」，如《搜神記》「既畢，命東榻而坐」、《洛陽伽藍記》「施功既訖，糞塔如初」所示；前者用於〔既＋動詞組，下句〕，後者用於〔動（＋賓）＋竟／訖／畢，下句〕。「既訖」就像「竟」、「訖」、「畢」一樣表示活動完結。反之，譯經帶「既」的複合標記數量很少，偶有採用似乎只是模仿書面語。「了」是近代新起的標記，它與狀語「既」合為「既了」，形式上應追溯到中古書面語，然而搭配非持續動詞「歎」，卻有如譯經「已」。例 (110)「既了」所反映的源流上的混亂，⁵⁹ 意味著「了」不僅收納了譯經的「已」，也收納了文士書面語的「竟／訖／畢」。

敦煌變文及《祖堂集》中有關「了」的舉例與分析，已見於過去研究，本文

⁵⁷ 中古譯經出現過多種跟「已」同功能的並列複合標記，囿於本文論旨，不擬細說。這些標記大都是並列複合原則的產物，證據是複合成分可以互換排序，例如《佛本行集經》「已訖」、「訖已」、「已竟」、「竟已」、「已畢」、「畢已」六種形式並存，是並列複合的典型表現。例 (106)「已訖」是中古譯經殘留形式，也屬於並列複合。

⁵⁸ 這種用例可以和第四（一）節例 (43) 至 (45) 中〔既＋動詞組，下句〕用例相互參照。

⁵⁹ 此一混用案例可與第六（一）節例 (92) 至 (95) 作比較。中古譯經「已」進入漢語所引起的混用情況是考察語言接觸效應很好的個案，惟其中牽涉種種複雜的問題，不是本文所能詳述。

不再贅述。最後要說明，唐代有些〔動（+賓）+了，下句〕用例是以「了」註記設想中的條件關係。試比較：

- (111) 目連向前尋問阿孃不見，路旁大哭，哭了前行，被（披）所由得見於王。（《敦煌變文集新書·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
- (112) 夫人聞了，又自悲傷。（《歡喜國王緣》）
- (113) 維摩言了出宮庭，梨（藜）杖將來拍手擎。（《維摩碎金》）
- (114) 任伊鐵作心肝，見了也須粉碎。（《維摩詰經講經文》）
- (115) 佛交濁世男兼女，成長了直須孝父母。（《父母恩重經講經文·一》）
- (116) 盧綰勃跳下階，便奏霸王：「王陵只是不知，若或王陵知了，星夜倍程入楚，救其慈母。」（《漢將王陵變》）

以上六例顯示唐代〔動（+賓）+了，下句〕兼用於實然與非實然表述。例(111)至(113)「哭了前行」、「夫人聞了，又自悲傷」、「維摩言了出宮庭」都是實然表述之例，陳說故事情節。例(114)至(116)「見了也須粉碎」、「成長了直須孝父母」、「若或王陵知了，星夜倍程入楚，救其慈母」表述假想事況，「了」註記設想的條件。這種「了」功能正相當於第五（二）節例(91)「我成佛已……終不捨於菩提之心」中的「已」。再看一個蔣紹愚(2007, 272)所舉的設想條件之例：

- (117) 汝今且住，我當求師。若尋得已，當告汝知。（《佛本行集經》）

可見唐五代〔動（+賓）+了，下句〕和中古〔動（+賓）+已，下句〕的格式意義是一致的。

（二）「動〔+〕了」及〔動〔+〕了（+賓），下句〕

中古譯經對應梵語動詞形態變化的「動+已」轉為定型複合「動〔+〕已」，為漢語帶來深遠的影響。在此之前漢語的體貌標記附屬於謂語，此後發展出附屬於動詞的體貌標記。「動〔+〕了」來自不帶賓語格式中的「動〔+〕已」，然而來源語法格式不帶賓語的限制卻不可能長久維持，因為定型複合是構詞規律，由定型複合規律生成的用例未必會長久保有其來源格式的約束。一旦「動〔+〕了」脫離不帶賓語的限制，語言中舊有形式也將會援例類推而解除限制。

準此，無論是通過定型複合新生，或者是舊有形式向新生形式類推，都可能取得帶賓語的資格。吳福祥 (1998, 453) 指出敦煌變文出現過四個「動+了」帶賓語的用例，我們贊同「見了師兄便入來」、「拜了起居，再拜走出」、「尋時縛了彩樓」應如吳福祥所說，是「動+了」帶賓語的用例。⁶⁰ 其中的「見了」、「拜了」、「縛了」未必是新生形式，然而無論新舊，都可取得帶賓語的資格。

定型複合格式的真實性可以從後續演變來印證。唐宋之交某些單音動詞開始通過「動〔+〕了」途徑創生使動詞，⁶¹ 指涉「特定因素導致賓語所稱之事物進入某種新狀態」，即如例 (118) 至 (120) 中的「謝了」、「白了」、「老了」所示：⁶²

(118)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李煜，〈烏夜啼〉)⁶³

(119) 如此春來春又去，白了人頭。(歐陽修，〈浪淘沙〉)

(120) 若使當時身不遇，老了英雄。(王安石，〈浪淘沙令〉)

這些具有使動意涵的用例，為近代定型複合「動〔+〕了」存在的真實性提供重要的佐證——唐宋口語裡「白」、「老」之類的單音詞已經不大能夠直接轉化為使動詞了，公認比較接近口語的五代詞及宋詞作品，都以「動〔+〕了」衍生新的使動詞。⁶⁴ 例 (119) 至 (120)「白了」、「老了」用於下句，可見複合「動〔+〕了」也脫離了用於上句的約束。「動〔+〕了」延伸出使動義是近代的新發展，這意味定型複合格式「動〔+〕了」地位確立。⁶⁵

⁶⁰ 至於「前皇后帝萬千年，死了不知多與少」是不是「死了」帶賓語，我們有所保留，因為「不知多與少」仍有很強的表述性。

⁶¹ 本文將形容詞當作動詞的次類，不另區別。以「動〔+〕了」合成使動詞，或許可以視為古漢語使動轉化規律在近代的替換規律。

⁶² 例 (118) 至 (120) 轉引自曹廣順 (1995, 18)。

⁶³ 致使「春紅謝了」的原因是下句「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之「風雨」。

⁶⁴ 潘維桂、楊天戈 (1984, 77-81) 列舉出宋元時期同「了」結合的動詞，包括「表示生、死、成長、變化」、「表示心理活動」、「表示存在和消失，有和無」、「表示短暫的活動，不表現為一個過程，也不涉及開始與結束」、「表示持續的動作，沒有結束」，此外還有「表示情態和狀況變化的形容詞」，大都具有「使動」意味。

⁶⁵ 使動義「動〔+〕了」是後來的發展。它的興起有兩種可能的路徑，一是（「動〔+〕已」>）「動〔+〕了」發生內部分化，二是使動詞「了」模仿「動〔+〕了」而生出同形異義的定型格式，其中「了」可以追溯到中古表示「使／讓」意義的動詞「了」，即如《世說·任誕》「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所示。對於這兩種可能，我們目前沒有特別的偏向。

曹廣順 (1995, 21) 曾引《續古尊宿語要》兩個時期收錄的洞山和尚的同一首詩，先前是作「天晴蓋却屋，乘時刈却禾，輸納皇租了，鼓腹唱謳歌」，後來被改為「天晴蓋了屋，乘時刈了禾，輸納皇租了，鼓腹唱謳歌」，其中的「動〔+〕却」更動為「動〔+〕了」，「輸納皇租了，鼓腹唱謳歌」保持原樣，可見複合的「動〔+〕了」跟要求搭配下句的「動+賓+了」是分化的格式。

就定型複合的立場來說，變文「尋時縛了彩樓」這類用例並不是出於〔動（+賓）+了，下句〕的「了」發生位移，而是〔動〔+〕了（+賓），下句〕確立，致使舊有和新起的兩種同義格式並行。由於新舊格式淵源甚深，新格式在短時間內也衍生出舊格式的所有功能，包括表示條件關係：⁶⁶

(121) 歡喜巡還正飲盃，恐怕師兄乞飯來，各請萬壽斲起去，見了師兄便入來。（《敦煌變文集新書·難陀出家緣起》）

(122) 幾時獻了相如賦，共向嵩山采伏苓。（張喬，〈贈友人〉）

(123) 如《易》，〈繫辭〉所以解《易》，今人須看了《易》，方始看得〈繫辭〉。（《河南程氏遺書·伊川先生語一》）

(124) 人須先拽轉了自己趨向，始得。（《朱子語類·訓門人八》）

例 (121)「見了師兄便入來」中的「見了師兄」是預想事況，後續的「入來」是以它為條件而提出的。例 (122)「幾時獻了相如賦」是自我期許，也是「共向嵩山采伏苓」的條件。例 (123) 至 (124) 前後分句的條件關係因為「須」和「方始看得」、「始得」搭配而更加明確，表示條件的成分「須看了易」、「須先拽轉了自己趨向」都由動後「了」註記。

到了這個階段，新舊格式競爭的態勢已然形成。中古晚期到唐五代之間，與動後「了」相關的語法形式如表三所示：

⁶⁶ 例 (122) 轉引自曹廣順 (1995, 18)。

表三：「了₁」相關的中古及近代語法格式

時代	格式	文獻
中古晚期	〔動（＋賓）＋竟／訖／畢，下句〕 〔動（＋賓）＋既竟／既訖／既畢，下句〕 〔動（＋賓）＋已，下句〕 〔動（＋賓）＋已訖／訖已／畢訖，下句〕* 「動〔＋〕已」	文士書面語
		中古譯經
唐五代	〔動（＋賓）＋已，下句〕 〔動（＋賓）＋竟／訖，下句〕 〔動（＋賓）＋已了／既了，下句〕 〔動（＋賓）＋了，下句〕 「動〔＋〕了」 〔動〔＋〕了（＋賓），下句〕	口語文獻

表三中由「*」註記的〔動（＋賓）＋已訖／訖已／畢訖，下句〕，僅大略以「已訖」、「訖已」、「畢訖」代表複合標記，實際見於中古譯經的遠不止於此。譯經有多種複合標記並存，反映出各地方言採用的複合形式不盡相同。「已訖」之類常見於早期譯經，「訖已」之類則是晉代以後的發展，當時「已」和梵語動詞形態變化的對應關係已經確立，應屬於並列式。

唐五代「動〔＋〕已」開始被「動〔＋〕了」替換。隨著「見了師兄便入來」一類用例數量增長，〔動〔＋〕了（＋賓），下句〕和舊有同義格式〔動（＋賓）＋了，下句〕也自然形成了競爭關係。這時候句末「了」也已經出現。有例證反映出幾種「了」並行的情況。以下是曹廣順（1995, 91）的舉例：

(125) 大率人難曉處，不是道理有錯處時，便是語言有病；不是語言有病時，便是移了這步位了。（《朱子語類·大學三》）

(126) 欲變齊，則須先整理了已壞底了，方始如魯，方可以整頓起來，這便隔了一重。（《論語十五》）

(127) 四爻「損其疾」，只是損了那不好了，便自好。（《易八》）

例 (125)「便是移了這步位了」是論斷，由句末「了」註記，動後「了」則表示「移」為移動後的狀態。例 (126)「則須先整理了已壞底了」承上啓下：就

上文「欲變齊」而言表示論斷，就下文「方始如魯」而言表示條件。句末「了」同時註記論斷和條件，⁶⁷ 動後「了」表示整理後的狀態。

例 (127)「只是損了那不好了」表示條件，由句末「了」註記，而動後「了」表示減損後的狀態。由上句句末「了」註記條件成分，承襲自敦煌變文〔動（＋賓）＋了，下句〕，如例 (128)「領吾言了便須行」所示：

(128) 汝須聽，莫疑悟，丈室維摩身病苦，領吾言了便須行，更莫推辭問疾去。（《敦煌變文集新書·維摩詰經講經文》）

如果主張動後「了」是出自〔動（＋賓）＋了，下句〕中的「了」前移，那麼例 (127)「只是損了那不好了」一句之內就包含兩個同源的「了」。這時候難以解釋為什麼已經前移的成分又重複出現在過去的位置上。反之，如果假設唐五代新起的〔動〔＋〕了（＋賓），下句〕和舊有的〔動（＋賓）＋了，下句〕並行，那麼在新格式已經站穩而舊格式還沒有全然消亡的南宋，曾短暫地出現過兩種格式標記並用之例，應為合理推測。

八· 結論

本文從蔣紹愚 (2001) 談起，探討譯經「已₂」與近代「了₁」的流變關係。第三至五節指出，先秦〔既＋動詞組，下句〕與中古〔動（＋賓）＋已，下句〕功能相同，「已₂」並沒有引入新的體貌意義，譯經流行的〔動（＋賓）＋已，下句〕應是〔既＋動詞組，下句〕表示既成的功能轉趨沒落之後的替換形式。第六節指出跟梵語動詞形態對應的「動＋已」在中古晚期蛻變為定型複合「動〔＋〕已」，這是近代附屬於動詞的「了」創生的關鍵。近代〔動（＋賓）＋了，下句〕與〔動〔＋〕了（＋賓），下句〕是並存的競爭形式；前者取代中古〔動（＋賓）＋已，下句〕，而後者源自譯經「動〔＋〕已」。

本文研究個案顯示，一個語言不太可能從別的語族的語言直接借入新的語法成分。梵語絕對分詞形態 -tvā 或 -ya 對應著漢語謂語附屬成分「已」，兩者所屬結構層級不同，在梵語而言是構詞的，在漢語是構句的。「已」由構句成分轉變為構詞成分是以漢語體系內固有的定型複合為途徑。「動〔＋〕已」成立，

⁶⁷ 這是從可能性設想。然而我們傾向把例 (126)「則須先整理了已壞底了，方始如魯」位在上句之末的「了」視為表示條件的標記。我們的解釋見於例 (127) 的析論。

「已」與非持續動詞結合越形緊密，對動詞的依附也就越加顯著，「動〔＋〕了」替換「動〔＋〕已」，「了」因搭配非持續動詞而持續虛化，附屬於動詞的「了」就跟附屬於謂語的「了」自然分流。

近代「了₁」的形成並不是單純模仿或類推就得以成就的。張洪年 (Cheung 1977) 指出梵語後綴 -tvā 和 -ya 有合體為 -tvāya 的現象，因此唐代複合標記「已了」、「已訖」可能出自外來語法的模仿。⁶⁸ 我們根據中古譯經的證據把複合標記的形成年代向上推到中古，那麼試問中古複合標記和梵語 -tvāya 是否相關？

根據 Whitney (1993, §993)，梵語並沒有 -tvāya，只有 -tvāya，⁶⁹ 其中 ā 代表與 ā 同部位的長元音；-tvāya 是單一（非合成）的詞綴，主要見於古老的吠陀語 (Veda) 文獻，見頻比同功能詞綴低得多。這說明中古到近代持續新生的複合標記不太可能出自梵語的影響。複合標記無寧是本源於中古漢語體系固有的並列複合機制，同一機制在近代初期句末「了」替換句末「也」過渡階段也曾衍生出並列複合的「了也」。⁷⁰

Chen and Wang (1975) 主張，語言演變的「驅動」(actuation) 因素和「實現」(implementation) 因素有別，⁷¹ 準此，語言接觸是「了₁」創生的驅動因素，但不是它的實現因素。它的實現因素仍須回歸漢語系統內部尋求——對應梵語動詞形態變化的「已」初入漢語時在漢語系統的規約下是附屬謂語的標記，語法性質迥異於與動詞附屬標記；對應梵語動詞形態變化的「已」進入漢語之後形成定型複合「動〔＋〕已」，繼而在「非持續動詞〔＋〕已」>「非持續動詞〔＋〕了」的環境下虛化，最終成為附屬於動詞的標記，所依憑的仍是漢語系統內規。

⁶⁸ 相關原文引述如下：“An even more interesting item to note is the Sanskrit form of *tvāya*, which appears to be a combination of two alternative perfective suffixes, *tvā* and *ya*. [22] A large number of the *bian-wen* examples demonstrate the juxtaposition of *yi-liao* or *yi-qi*... One possible analysis of *yi-liao* and *yi-qi* is, of course, to regard them as compound particles created as imitations of Sanskrit *tvāya*.” 見於張洪年 (Cheung 1977, 66-67)。引文中 [22] 為註解號碼，按原樣保留；刪節號之內是變文「已了」、「訖已」的用例，與論旨無關，權且略去。

⁶⁹ 此項梵文資料是陳淑芬教授所提供。Whitney (1993) 用來表示與 ā 同部位長元音的符號是在原本的 ā 上面再加一個小勾，本文囿於符號表的限制，改以 ā 表示。

⁷⁰ 近代初期《祖堂集》中的句末「了也」用例見於魏培泉 (2002)。關於「了也」乃至於中古與近代之交諸多動後「已」同功能的並列複合標記，請參閱劉承慧 (2010)。

⁷¹ 援引 Chen and Wang (1975) 提出的「驅動與實現分立說」是審查人的建議，謹此註明。

至於第二（三）節提出的問題：何以「了₁」和「了₂」這麼重要的兩個語法標記竟採用同一個形式來表示，試以例（129）至（130）略作說明。⁷²

（129）我於當時，求智求道。若負他債，悉償令了。（《佛本行集經》）

（130）又方：淨洗了，搗杏人和豬脂塗。（《齊民要術·養牛、馬、驢、騾》）

例（129）至（130）顯示單音動詞「了」在中古並沒有語法位置上的限定。「了」同時替換〔動（+賓）+已，下句〕中的「已」和〔動（+賓）+也〕中的「也」，是因為它可以自由地用於上句與全句之末。這種情況正像先秦「矣」：「矣」常用於全句之末，也用於連動式上句，如第三（二）節例（19）「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所示。近代初期既成貌標記「了」的語法表現並沒有越出先秦同功能標記「矣」的格局。這是漢語既成貌標記的共性。

然而近代「了」畢竟是出現迥異於「矣」的變化，這是因為譯經「動〔+〕已」後續形式「動〔+〕了」中的「了」持續虛化，致使動後完成貌標記創生，進而與謂語後加的既成貌標記分流為「了₁」和「了₂」。「了₂」一仍先秦「矣」，「了₁」則是全新的創製。我們還不曉得〔動〔+〕了（+賓），下句〕是在近代哪個階段完全替換〔動（+賓）+了，下句〕，不過〔動（+賓）+了，下句〕被替換的同時，其他變式也被替換，是可以肯定的。

準此，「了₁」、「了₂」相關的語法格式與功能應如表四所示。近代〔動（+賓）+了，下句〕源自中古譯經〔動（+賓）+已，下句〕，「了」是既成標記。近代新興〔動〔+〕了（+賓），下句〕中的「了」是動詞附屬成分；隨著它和動詞的依附關係越形緊密，「動〔+〕了」將不再是複合單位，「了」也將成為「了₁」。

⁷² 例（129）轉引自蔣紹愚（2007, 276），例（130）也見於楊秀芳（1991, 227）。

表四：「了₁」、「了₂」相關的語法格式及其功能

了(>Ø)	〔動(+賓)+了, 下句〕	既成
	〔動(+賓)+了, 下句〕	條件
了 ₁	〔動〔+〕了(+賓), 下句〕 〔動〔+〕了+賓〕	完成
	〔動〔+〕了(+賓), 下句〕	條件
了 ₂	〔動(+賓)+了〕	既成
	〔動(+賓)+了〕	論斷
	〔動(+賓)+了〕	評價

我們不清楚〔動(+賓)+了, 下句〕在哪個階段的共同語走上衰亡, 但可以確定的是現代共同語已經失落。我們也不確知「了」是在哪個歷史階段的共同語變為完成貌標記「了₁」。若從道理上推斷, 「動〔+〕了」中的「了」一旦失去補語性質, 變成狹義的動詞附屬標記(後綴), 它的註記範圍將只限定在動詞, 註記條件的功能自然衰微。過去〔動〔+〕了(+賓), 下句〕表示條件關係, 如「吃了飯再走」, 現在幾乎都是「吃了飯以後再走」, 甚至不用「了」的形式「吃飯以後再走」更為常見。這意味現代共同語「了₁」完全確立。

(本文於民國九十八年二月六日收稿; 同年八月二十日通過刊登)

後記

本文為2005-2006年度國科會計畫 (NSC94-2411-H-007-016) 研究成果, 文中語料檢索自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古漢語語料庫」(telnet://dbo.sinica.edu.tw)。本文緣起自多年前梅祖麟教授惠賜〈先秦兩漢的一種完成貌句式——兼論現代漢語完成貌句式的來源〉手稿影本, 當時作者對相關歷史語法現象並沒有足夠的認識, 無從表示意見。本文初稿撰寫期間, 連金發教授建議參考陳淑芬 (Chen 2006), 使作者對於譯經語言和梵語之間的關係得到較多的理解。初稿曾於2007年3月在新竹國立清華

大學語言學研究所例行的討論會上宣讀，連金發、蔡維天教授都提出寶貴的建言。2007年底承蒙蔣紹愚教授寄贈陳前瑞 (2008) 初稿。又為梵語問題多次向陳淑芬教授求證。受惠於許多協助，謹此銘謝。最後要感謝兩位審查人建設性的提示，使本文免於冗贅。本文文責歸屬於作者。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皆出自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古漢語語料庫」(telnet://dbo.sinica.edu.tw)，搜尋：約爲二〇〇五至〇六年度國科會計畫執行期間。

二・近人論著

王力

1944 《中國語法理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4。

吳福祥

1998 〈重談“動+了+賓”格式的來源和完成體助詞“了”的產生〉，《中國語文》267：452-462。

李訥、石毓智

1997 〈論漢語體標記誕生的機制〉，《中國語文》257：82-96。

曹廣順

1995 《近代漢語助詞》，北京：語文出版社。

梅祖麟

1981 〈現代漢語完成貌句式和詞尾的來源〉，《語言研究》1：65-77。

1994 〈唐代、宋代共同語的語法和現代方言的語法〉，《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2：61-97。

1997 〈漢語語法史中幾個反覆出現的演變方式〉，郭錫良主編，《第二屆國際古漢語語法研討會論文集》，北京：語文出版社，頁15-31。

1999 〈先秦兩漢的一種完成貌句式——兼論現代漢語完成貌句式的來源〉，《中國語文》271：285-294。

許嘉璐

1987 〈論同步引申〉，《中國語文》196：50-57。

陳前瑞

2008 〈句末“也”體貌用法的演變〉，《中國語文》322：28-39。

楊秀芳

1991 〈從歷史語法的觀點論閩南語「了」的用法——兼論完成貌助詞「矣」（「也」）〉，《臺大中文學報》4：212-284。

趙金銘

- 1979 〈敦煌變文中所見的“了”和“著”〉，《中國語文》147：65-69。

劉承慧

- 1999 〈先秦漢語的結構機制〉，《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5：565-591。
- 2002 〈試論漢語複合化的起源及其早期發展〉，《清華學報》32：469-493。
- 2003 〈古漢語實詞的複合化〉，何大安主編，《古今通塞：漢語的歷史與發展》，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頁107-139。
- 2007 〈先秦「矣」的功能及其分化〉，《語言暨語言學》8.3：743-766。
- 2008 〈先秦“也”、“矣”之辨——以《左傳》文本為主要論據的研究〉，《中國語言學集刊》2.2：43-71。
- 2010 〈漢語並列複合標記的作用——從唐宋時期的並列複合標記「了也」談起〉，《語言暨語言學》11.2：393-424。

劉勛寧

- 1985 〈現代漢語句尾“了”的來源〉，《方言》1985.2：128-133。

潘維桂、楊天戈

- 1984 〈宋元時期“了”字的用法，兼談“了”字的虛化過程〉，《語言論集·第二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頁71-90。

蔣紹愚

- 2001 〈《世說新語》、《齊民要術》、《洛陽伽藍記》、《賢愚經》、《百喻經》中的“已”、“竟”、“訖”、“畢”〉，《語言研究》42：73-78。
- 2007 〈語言接觸的一個案例——再談“V(O) 已”〉，《語言學論叢》36：268-285。

魏培泉

- 2002 〈《祖堂集》中的助詞「也」——兼論現代漢語助詞「了」的來源〉，《含章光化——戴璉璋先生七秩哲誕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頁491-543。

Chen, Matthew, and William Wang

- 1975 “Sound Change: Actu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Language*: 255-281.

Chen, Shu-Fen (陳淑芬)

- 2006 "Dharmagupta's Translation of the Diamond Sutra (Vajracchedikā 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In *On and Off Work: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Chin-Chuan Cheng on his 70th Birthday*, edited by Raung-fu Chung, Hsien-Chin Liou, Jia-ling Hsu and Dah-an Ho.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pp. 287-303.

Cheung, Samuel (張洪年)

- 1977 "Perfective Particles in the Bian-Wen Languag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5: 51-74.

Comrie, Bernard

- 1976 *Aspe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 Charles, and Sandra Thompson

-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yons, John

- 1995 *Linguistic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ulleyblank, Edwin (蒲立本)

- 1994 "Aspects of Aspect in Classical Chinese." In *Paper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Pre-Qin Chinese Grammar*, edited by R. Gassmann and L. He. Changsha: Yuelu Press, pp. 313-363.

Smith, Carlota

- 1991 *The Parameter of Aspects*.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Whitney, Dwight

- 1993 *Sanskrit Gramm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eventeenth issue (1993) of the second edition (1989).

The Influence of *Yi* from the Translated Buddhist Texts on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Verb Suffix *Le*: The Impact of Language Contact on Grammatical Changes

Cheng-hui Li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When the perfective aspect verb suffix *le* (了) emerged in Pre-Modern Chinese, it brought about a new aspectual perspective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system. Mei (1999) suggests that the emergence of the verb suffix resulted from motivations internal to the language, while Jiang (2001) attributes the change to the aspect marker *yi* (已),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gerund form of Sanskrit and was widely used in translations into Medieval Chinese (the linguistic stage preceding Pre-Modern Chinese) of Buddhist texts.

The issue is revisited in this paper through (1) the comparison of *yi* (已) in the Buddhist texts with formerly existing aspect markers of Chinese origin *ji* (既) and *yi* (矣), and (2) the comparison of *yi* (已) with its descendant *le* (了). It is proposed that *yi* (已) carried out the same function as *ji* (既) and *yi* (矣), but the fact that it was often placed immediately after a verb caused it to resemble the gerund suffix incorporated into the verb root in Sanskrit. The instances in which *yi* (已) resembles Sanskrit gerund forms were introduced into Medieval Chinese via coordinative compounding, [V + *yi* (已)], a popular way of coining new words at that time. In the next linguistic stage, Pre-Modern Chinese, [V + *le* (了)] replaced [V + *yi* (已)], and *le* (了) was grammaticized into a verb suffix when it co-occurred with achievement verbs in this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Chen and Wang (1975), what actuates a linguistic change may differ from the ways in which this change is implemented. The verb suffix *le* (了) was actuated by a form corresponding to the Sanskrit suffix, but it was implemented by virtue of the Chinese compounding rule. The change during which the second component of coordinative ([V + *yi* (已)] >) [V + *le* (了)] turned into the suffix of the

劉承慧

verb did not begin until [V + *yi* (已)] had been implemented, and the ultimate product of the verb suffix emerged due to an internal motivati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Keywords: *yi* (已), *le* (了), perfective aspect verb suffix, language contact, Chinese historical grammar